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千秋功罪】	九一三，林彪事件从此改变中国	李 辉
【书刊评论】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丁 东
【亡灵祭坛】	铁马的绝路：陈梦家之死	李 舒
【史海钩沉】	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	阎 淮
【人物春秋】	否定文革不如清算文革：专访牛辉林	江 迅
【各抒己见】	为罪恶招魂	贺卫方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千秋功罪】

九一三，林彪事件从此改变中国

• 李 辉 •

◇ 北京的紧张之夜

一九七一年的国庆节如期来临。

北京城，期待一年的又一次国庆节盛大集会与游行，却意外地没有如期出现。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年十月一日都是北京隆重、狂欢的时刻。国庆集会与游行如期举行，无一例外地，总是由毛泽东本人在这一时刻亲率党和政府高层核心成员，集体走上天安门城楼隆重亮相。“文革”爆发之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的连续五年，每当这一盛况出现时，多了一个新的景观，被称为毛泽东“亲密战友”的林彪每次都会站在毛泽东身旁。

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新《党章》明确表述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八大”时曾有多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时仅有林彪一人。于是，国庆节这一天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第二天会醒目地刊发在各大报纸头版。

然而，一九七一年，距“九大”召开仅仅两年有余，曾有的国庆节应有的隆重庆祝，踪影全无。如果将一九七〇年与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二日的《人民日报》的版面稍加比较，即可给人颇为悬殊的深刻印象。

一九七〇年的国庆节，林彪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格外耀眼的一个主角。

仅仅过了一年，一九七一年的国庆节，与前一年大相径庭——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只有文字，没有一张图片，既没有毛、林二人的合影，也没有毛泽东个人的照片。同时，这一天，“两报一刊”也没有发表国庆社论。

十月二日，前一天没有举行国庆节隆重集会与游行，《人民日报》第一版自然就没有了毛泽东与林彪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国庆节为何如此冷冷清清？天安门城楼为何没有了去年那些显赫的身影，没有了长安街上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没有了天空绚烂绽放的焰火？

一切，因为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至十三日凌晨之间，中国政坛上突兀而至一阵电闪雷鸣，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一突发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清晰可见，或众说纷纭，或扑朔迷离……真相与内幕，永远吸引人们目光，为今人，也为后人，留下巨大的叙述空间和解读层面。

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如何演变，这里暂且节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的部分叙述如下：

毛泽东……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毛泽东传》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定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毛泽东传》（下），1600——1601页）

惊心动魄的一幕，由此拉开。

◇ 毛泽东搬到了大会堂

毛泽东显然第一时间便获知三叉戟起飞的消息。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飞机起飞三十多分钟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住所与周恩来一起处理突发事件。以此推算，在十三日零点十分之前，他便获知这一消息。第一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从年谱的记载看，毛泽东似乎并不十分吃惊，也不慌乱，反而显得颇为从容不迫。目前所知的是，想必出于应急处理的需要等重要原因，毛泽东从中南海住所转移至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下。这一个不平凡的十三日，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成为巨大的政治漩涡的中心。《毛泽东年谱》记载：

9月13日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出逃的情况。在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起飞三十多钟快接近中国和蒙古国边境时，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随后，批准发出全国禁飞令，并要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并研究部署应变措施。在周恩来安排下，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暂住。

同日晚上，阅周恩来报送的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批示：“照办。”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还说：“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后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所附情报室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毛泽东年谱》（6），405页）

“中国人来了！”蒙古军队进入一等戒备状态。中国与苏联交恶多年，边境地区曾爆发过冲突，“不明作战飞机”的闯入，显然令蒙古人为之紧张。

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消息，第二天中午，得到来自蒙古的官方确定：

9月14日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将蒙古外交部告知的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机毁人亡的情况，用专线电话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获知后，即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特急电。电报要许大使即约见蒙外长，告以奉命通知：对中国失事飞机误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和其他遗物。毛泽东批示：“照发。”

——（同上，406页）

是谁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林彪飞机坠毁的记载，《毛泽东传》与《毛泽东年谱》略有不同。《毛泽东传》叙述说，周恩来收到大使馆的特急报告后，是要汪东兴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而非周本人。汪东兴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对这一汇报过程，有颇为详细的细节描述，值得摘录如下：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转引自《毛泽东传》（下），1603页）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坠毁的消息传来时，距国庆节来临只剩下半个月。

据《毛泽东年谱》，九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向群众解释今年不举行国庆节游行的材料，决定今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也不放焰火，而改为各种形式的分散性的庆祝活动。接到这一通知时，想必绝大多数人不会了解其中的内幕和背景。他们哪里知道，仅仅两个星期之前，他们熟悉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多少高层人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而扣人心弦的不眠之夜？他们更不可能猜想，去年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接班人林彪，竟会与毛泽东彻底决裂，甚至到了难以相容的境地。

有谁敢如此猜测？

◇ 全世界在猜谜

谜团，谁能解开？

《中国之谜的更多碎片》——十天之后，十月十一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在“世界新闻”版块，用这一标题报道整个世界的疑惑与猜测：

在中国的月份牌上，没有哪一天能比十月一日更为神圣。北京会在这一天，庆祝毛泽东的军队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打败国民党的最后胜利。可是，上个星期，二十三年，中国破天荒地却没有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天安门广场也没有游行队伍，没有明确清晰的社论，毛泽东与中国领导层，也没有按序排列集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全世界的关注目光，没有任何解释，只有显得不太当回事的北京电台，嘲笑这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造谣”。北京不愿意，或者不能澄清最重要的一年一度国庆节前夕，这一政权发生过令人诧异的重大事件。各国专家仍旧相信，这种神秘感反映紫禁城的权力斗争，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尼克松的访问，以及其他事务的进展，在中国之谜的各种猜测得到证实之前，恐怕只能漫无头绪。

——（《时代》，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就在这篇报道中，“九月十三日”——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神秘的日子之一——出现了。在《时代》看来，中国官方做出的因经济原因而取消例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的理由，不足以让人信服：

这一神秘性在三个星期之前初露端倪。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军队首脑，二十人的政治局的众多成员，突然集体消失。大部分中国空军在九月十三日停止飞行，后归为日常状态。中国外交部随后宣布，常例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因经济原因”而取消。这一理由似乎不适用于中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代表处；他们仍举行前所未有的、丰盛的国庆招待会，包括在日内瓦举办的一次盛大晚宴，邀请五百名嘉宾，足足上了十道菜。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九·一三”全国范围的空军停飞，国庆节各项例行活动或取消或降格，这种情形，在任何一个国家，绝非小事，引发对某种危机的猜测，极为自然。人们首先怀疑，中国两位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前者有两个月未公开露面，后者有四个月未公开露面，其中一位，是否已经去世，或者病危，难以逆料。《时代》写道：

谜团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最初，有人认为，危机的发生恐怕因为毛已去世或者病重，七十七岁的他一直备受帕金森症的折磨。中国问题专家相信，他的接班人、六十三岁的国防部长、副主席林彪，患有肺病，没有康复，而是已经去世。的确，自八月以来毛从未公开露面，林的上次公开露面还是在六月。不过，中国外交官坚称，党的核心中的这两位地位最高者，身体依然健康。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其实，此时许多中国外交官，恐怕与亿万中国民众一样，未必清楚“九·一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一次“折戟沉沙”？他们的坚决否认，或许真的因为不知情。不过，中方外交官的否认，却无法遮蔽“九·一三”这一天，一架中国空军飞机，“原因不明”而飞入蒙古境内，并在沙漠坠毁的事实。由于坠落地点在苏联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苏联塔斯社随后报道这一消息，只不过飞机上的“叛逃者”主角是谁，暂无公开。这种模糊性的报道，不能不引发对飞机上的这位主角身份的猜测。

有意思的是，《时代》的报道，猜测刘少奇或者吴法宪可能是“叛逃”主角：

上个星期，最轰动、可能性最大的一个角色浮出水面，他是地位很高的叛逃者，是此次政治风暴的主角。苏联塔斯社报道蒙古发布的消息，“原因不明”的一架中国空军飞机，坠毁在蒙古东北部，距苏联边境仅六十英里。飞机坠毁是在九月十二日夜间，即中国空军突然停飞的前一天，飞机残骸上发现九具尸体，部分武器和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会是这名重要中国叛逃者作为最好见面礼的秘密档案吗？有人分析，此位叛逃者可能会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于一九六七年被视为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而被开除出党，并一直被关押。另外，也可能是空军司令、政治局委员吴法宪，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联合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被视为激进派。当然，作为一名极左分子，他很难指望苏联这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能热情欢迎他。不过，官方的《人民日报》上个星期，发表一篇批判文章，不点名地说“脱去他们的外衣”，以此证实存在叛徒的说法。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时代》猜测显然有误。刘少奇与吴法宪，两个完全不搭界、也完全不可能的人物，九月十三日，都不可能出现在飞机上。

世人不知，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在关押期间已经病逝于河南开封。火化时，死者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刘少奇上学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因此，社会上几乎无人知道死者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因此，世界知道刘少奇已经去世的人相当之少。其实，即便依然在世，关押中的刘少奇，又怎么可能登上飞往国外的飞机，成为“叛逃”主角？

吴法宪当然也不可能。九月十二日、十三日，身为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正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直接参与处理这一紧急事态。

◇ 潮起潮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毫不奇怪，乘坐三叉戟飞机“叛逃”的这个主角到底是谁，外界当然猜测不出。不过，《时代》却根据这一事件的发生，推断中国高层的政治斗争相当紧张。此说并非无端臆测。《时代》认为，中国高层的军方务实派和政府温和派，在与“党内左派激进分子”的较量中，可能占据了上风。一直被西方视为务实派、温和派核心人物的周恩来，在国庆节期间的频繁亮相，无疑是一个明显标志。《时代》写道：

如果真的有叛变企图，这可能是一个征兆，而非北京政治争斗的起因。极大可能是，这一争斗近年来日趋紧张。军方务实派和政府温和派，试图摆脱文化大革命期间崛起的党内左派激进分子。温和派获胜的一个迹象，中国精明的周恩来威望大增。大部分中国领导人其能力缺乏，因此，周几乎每天都公开露面。他是唯一在国庆节露面的最高领导人，他陪同流亡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游览北京郊区的颐和园。周在国外享有威望。上个星期，加拿大和冰岛，加入到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提案的国家行列，投票赞成北京政权在联合国取得代表中国的唯一席位。在等待二十年后，毛的政权如果进入联合国，恰是国内出现混乱状态之际，恐不免是一个讽刺。

——（《时代》，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叛逃”主角到底是谁？毛泽东、林彪两位地位最高者，到底是谁已经去世或者病危？世界性的猜测仍在继续。

毛泽东终于公开露面了。十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埃塞俄比亚塞拉西一世皇帝的消息，成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重大新闻。

经查《毛泽东年谱》，这是时隔整整两个月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上一次是八月八日会见来访的缅甸总理奈温。如将先后两次会见的照片细细对照，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身体比两个月之前显得虚弱，站在人群中央，身姿没有了两个月前的自如。十月，距生日还有两个多月，毛泽东还不到七十八岁。这一点，在前些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得到公开证实。《毛泽东传》毫不避讳地写到，实际上，毛泽东的身体因林彪这一突发事件而迅速衰弱，甚至恶化，这与在他人回忆中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毛泽东表现得颇为淡定、从容的状况，颇为不同：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

——（《毛泽东传》（下），1610——1611页）

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之际，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塞拉西皇帝，时隔数月，第一次公开亮相。会见时，塞拉西皇帝希望毛泽东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没有避讳自己的身体状况，坦言道：

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病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毛泽东年谱》（6），410页）

当然，这些谈话内容不可能见诸当时报道。反倒是在十天后出版的《时代》上对两人的会见细节，略有披露，其来源为塞拉西皇帝的随同人员。《时代》报道说：

毛泽东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众视野消失一段日子，然后又戏剧化地亮相——或横渡长江，或登上天安门城楼，或会见来访要人。上个星期，在又一次销声匿迹并令人们牵肠挂肚之后，毛重新亮相，此次，他会见访问北京的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据陪同访问的二十七位助手之一所述，毛主席看上去脸色红润，毛“笑着握手欢迎他的尊贵客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百零五分钟的会谈，毛显得“心情甚好，爱讲笑话”。

自八月初以来，这是毛的首次公开露面，再次推翻了关于他可能已经去世或者身患重病的猜测。尽管如此，毛的出现，仍旧使上月初以来弥漫北京的神秘事件——即突然取消国庆节庆祝游行——增加其复杂性。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该报道最后一句说得不错，毛泽东的公开露面，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叛逃”主角的猜测。这篇报道的标题为《北京的健在者》，那么，谁是“不健在者”？《时代》只能根据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统计高层领导人的行踪，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许多分析家仍旧相信，这些事情反映出尖锐的政策论争，几乎肯定的是，卷入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军队与政府领导人的务实派联盟，他们如今掌握着中国各级的大部分权力；另一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崛起的咄咄逼人的左翼激进派。政治局二十一人中，有十二人至少一个月未露面，这一事实表明，政府最高层的双方斗争相当激烈。然而，北京一如既往地尽力消除人们对毛政权已陷入混乱甚至瘫痪的猜疑。恐怕由于这一原因，中国人已做好准备，接受并宣布基辛格即将第二次访问北京。

可是，有些情况显然不准确。五个星期前，一架载有九人的中国飞机，神秘地坠毁在蒙古境内，中国空军当即突然全部停飞。三名最高地位的军方领导人，包括左翼激进分子的领导人之一、总参谋长黄永胜，已有一个多月未露面。这些日子，在北京露面最多的是不倒翁、务实的倡导者周恩来总理。上个星期，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不同身份的七十位美国人组成的一个访问团，其中包括黑豹党成员伊休·牛顿（Huey Newton）、老中国通谢伟思（John Service）。周以毛的名义为中国最近与美国开始接触的举动进行辩护。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世界猜测中国谜团的日子里，《时代》提到英文《中国画报》七、八月合刊号，发表了江青拍摄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幅肖像照片最为引人注目，其主人公，正是六月以来在公开场合踪影全无的林彪：

不过，周的高调出场并不必然意味着务实派完全取胜，除周之外，目前北京舞台上还有另一位活跃人物，她是毛夫人江青，文化大革命期间指挥红卫兵的领导人中最红之人。差不多两年时间里，她淡出公众视野，但最近一期英文宣传刊物《中国画报》，发表毛夫人拍摄的十一幅彩色照片，其中一幅肖像颇为少见，是多时未露面的毛的接班人林彪。林的最近一次露面是在六月，照片上他正在读毛主席的红宝书——但是他没有戴军帽，而在过去，军帽从来都戴在头上。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江青以“峻岭”为笔名发表的这组照片，同期发表于《人民画报》七、八月合刊，英文版《中国画报》应是《人民画报》的英文版。照片上，林彪身穿军装，手捧毛泽东著作在认真阅读，照片说明写为：《孜孜不倦》。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江青拍摄林彪的照片，在刊物

发表的时间与“九·一三”这个日子相距如此之近，当世界性的猜测之际，无疑会让难以获得内幕确切消息的《时代》，从新闻敏感的角度来一番不同寻常的解读，甚至林彪未戴军帽也似乎有了某种意味。

谁是“叛逃”主角？“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这一谜底世界仍不知晓。在当今网络时代，如此重大、爆炸性的一个事件，却能秘而不宣长达数十天，简直不可想象。这便是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有了充裕的保密时间，也就可以做好各种准备公开“叛逃”主角身份，向不明就里的亿万民众说明情况，以充分的缓冲过渡，避免其震动过大，使民众渐渐接受未曾预料、也难以想象的这一突发事件。

当西方外交官就此事询问时，中国官员这样应答：

中国观察家们不可能对销声匿迹、重新亮相、飞机停飞等所有类似事情无动于衷。中国的官员建议西方外交官：“与其猜测，不如等待，不用太久，你们就会清楚。”谜团一时不会解开，除非召开延期已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何时召开的日期仍未宣布。

——（《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谜团几个月后终于解开，全世界知道了谜底——在温都尔汗沙漠坠落的三叉戟飞机上，正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跃居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并在九月九日选为《时代》封面人物。封面上，林彪身后一个大大的中文“二”，显示他的地位蹿升。时隔五年零四天，九月十三日，曾经的封面人物，曾经的风云人物，一去不复返。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由此翻开。

□ 摘自《六根》微信号

~~~~~

# 【书刊评论】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 丁 东 •

《吴法宪回忆录》全书80余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从家世、参加红军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空军，叙述的基调与官修史书基本吻合。下卷从1959年庐山会议写到济南保外就医的晚年生活，重心是文革中的亲身经历，所述所忆不为官方定论所束，是全书史料价值的精华所在。作者很清楚这一点。他在全书的结尾写到：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学术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用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像是一团谜一样。我感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不论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

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如果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在哪些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什么原因导致了冲突？他们和毛泽东同样倚重的周恩来等人是什么关系，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林江之间的冲突中持什么态度？这些问题有的为官史所回避，有的有所涉及，语焉不详。官方的结论，固然有利于当时的高层权力平衡，但有些重要问题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比如，1970年庐山会议发生的斗争，到底是怎么斗起来的？起因是什么？毛泽东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到底是谁要炸谁？为什么要炸？官方的史书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基调，先是说陈伯达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又说林彪篡党夺权。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又比如，九大以后，江青和姚文元借批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篇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影射批判林彪讲话，在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多次，不仅为林彪一派所反对，也为周恩来一派所反对。周恩来甚至对江青发了脾气。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

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大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本书是作者在没有条件查阅档案的情况下完成的个人回忆录，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记忆差错。但通读此书，感到作者主观上确有求真之意。他声明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分析，不作结论。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也绝不违心地去承认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他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有权查阅档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已属难得。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一心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两种回忆录，哪一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后者。过去常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反而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者个人撰写的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存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本。况且，他们写作时虽然已非戴罪之身，实际上还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曾经反复交待，所以记得十分清楚。这些回忆录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受到史家的特别重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 摘自《小众群言》微信号

~~~~~

【亡灵祭坛】

铁马的绝路：陈梦家之死

• 李 舒 •

前几天写傅雷，是为了把9月3日这一天留给他。

我承认自己有些偏心。

按照他自己的预想，他的五十周年忌日，应该在前几天的。

王府井大街上有一条东厂胡同，在明代，这里是东厂所在地。1625年，因为上书弹劾魏忠贤，左副都史杨涟等六人被天启皇帝投入东厂狱中，每五日拷打一次，用土囊压身，以铁钉贯耳，最终被残害致死。

1966年8月24日，这条曾经见证了无数忠臣坚贞不屈的胡同，再次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

这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革命小将们满城抄家，打人毁物，没收财产。在东厂胡同，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的两位老年妇女。

“像杀猪一样”，很多年之后，家住东厂胡同的刘大爷还能记得这个声音。他坐在竹椅上，静默了很久。

那一夜，东厂胡同的许多人都没能睡觉，因为凄厉的惨叫持续了一夜，到黎明才慢慢减弱——天亮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至少有六个人死了。

东厂胡同旁边，就是考古研究所。那一晚，听到惨叫声的除了东厂胡同的居民，还有一个人。

这一天白天，他被红卫兵揪斗，戴上了“流氓诗人”的高帽子，被关在考古研究所里，这一幕，他早就预见到了。

那是十几年之前，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广播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操，别人都不以为然，只有他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1984》是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

8月24日夜里，他听见窗外的惨叫，以及伴随每一声惨叫而来的铜皮带鞭打的声音。皮带触及到人的皮肉上，发出一些沉闷的回声，仿佛打在棉花上。“也许不是人。”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又有一声惨叫，否定了他的猜想。

他对同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然后，他写下了遗书，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片。

8月24日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七，新月。

他20岁的时候，写过一句诗：“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要是那天晚上死了，也许是个不错的结局。

然而没有，剂量不够，他活下来了。

整个民国我最爱的诗人，不是徐志摩，不是卞之琳，不是闻一多，是他。

陈梦家。

一

梦家，梦见家乡，一个多美的名字。

然而赵珩先生回忆，陈梦家曾经在凌霄花下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梦家吗？”

“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做梦见家了？”

“不是。是我母亲生我之前梦见一头猪，但是我总不能叫梦猪吧？所以就把猪上面加了一个宝盖。”

赵珩先生也不能断定这个故事的真假，不过，“家”的甲骨文，确实是宝盖头下面一个“猪”。而陈梦家的弟弟叫陈梦熊。

陈梦家是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是位牧师。据说，牧师父亲从十岁开始学习基督教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可偏偏不学英文，理由是：上帝人人可爱，倘若借宣扬宗教而输入我国种种不利的势力，他就要抵抗。

陈梦家也继承了父亲的这股子倔强，尽管，从外貌上看不出来。

我承认，记住陈梦家，是因为他长得帅。

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清澈而意气风发，眼下还有卧蚕。他的眉毛稀疏，然而头发浓黑，鼻子和唇都是中国古典美男子的典范。

很多年之后，扬之水在麦当劳问赵萝蕤，当初为什么选陈梦家？她以为老太太会说陈梦家的学问，会说他的诗写得好的，然而赵萝蕤却坦荡地回答：“因为他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的陈梦家先生最初攻读的是法律，1932年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获得了律师执照，然后跑去写新诗，成为了“新月派四大诗人”，写了两年又跑去燕京大学研究院，研读古文字学，学霸的人生，除了仰慕，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样的人，钱钟书也不是他的对手。

据说，《围城》里的唐晓芙，原型乃是赵萝蕤，钱钟书当年追求过赵萝蕤而不得，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赵萝蕤在燕京是校花，这是没有争议的。赵萝蕤出生于1912年，父亲赵紫辰是基督教神学家，赵萝蕤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10岁时，祖父问她：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赵萝蕤回答：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最后，她成了燕京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

1937年，25岁的赵萝蕤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版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据说，艾略特在1946年夏天回美探亲，7月9日，他特别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吃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

赵萝蕤在燕京的名声很大，不仅仅因为她是同年级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还因为她的多才多艺，据说她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皆大欢喜》，扮演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连清华外文研究院的叶公超先生也来看，有人当场指着说：“喏，那就是他！”

陈梦家如何追到了赵萝蕤，大家已经无从知晓。但看照片，这确实是一对璧人，他们都出生于基督徒家庭，都热爱文学与诗歌，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风雅才子，一个是世间再也没有这样相称的两个人。钱穆曾经写道：“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1935年，他们向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坦诚了自己的爱情。4月9日，赵爸爸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我认识梦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你们要文定，就自己去办；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

仪式果然很简单，1936年1月，陈梦家和赵萝蕤结婚，婚礼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叶公超先生给他们送了贺礼：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瓷瓶，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

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家，在燕大旁边的王世襄家。王世襄有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这位日后的文物大家，当年是个玩得“昏天黑地、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他和陈梦家夫妇成了一生挚友。晚年的赵萝蕤和王世襄笑谈当年一桩公案：有一个深夜，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把她和陈梦家吓坏了，以为有强人到来。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过了半晌，觉得没有出事，才敢入睡。原来正是王世襄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

在王世襄眼里，陈梦家无论是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他一直抽锡纸包的大前门，永远喝龙井。陈梦家是王世襄收藏古玩的领路人，每次走进古玩店，商人对他永远毕恭毕敬。陈梦家喜对每样古物进行品评，也喜欢把自己的好烟分给古董商，因为善于画画，他三两下就能描摹出器物。

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的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提起他的早逝，王世襄只说了两个字：“可惜。”

那两个字，他说了好几遍。

二

我们更熟知的，也许是作为青铜器专家的陈梦家，然而作为诗人的陈梦家，是陌生的。

而我最爱的，便是陈梦家的诗。

我从孔夫子网上买下价格不菲的《梦家诗集》，《铁马集》还有他编辑的《新月诗选》。在北京的大风天气里，我常常一天都不出门，躲在家里，读他的诗，读着读着，就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自己要吃饭，忘了一切。

他的诗，亦如他的人，是温柔的，如微风。但那风是有骨气，并不媚俗，他本质上更似铁马，泠泠作响。我最喜欢那首写于1929年的《一朵野花》，《北平无战事》里，梁经伦曾经提起。

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试着读了一次，不大好，不要嘲笑我。

有趣的是，他的妻子赵萝蕤却说，自己想要当个非“新月派”的理性诗人，于是她特别写了一首《中秋月有华》：

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
多半是假的
何以这样圆
圆得无一弯棱角

1937年，这对恩爱的小夫妻离开北京，迁居昆明，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教书。因为规定不准夫妇同在一所学校任教，赵萝蕤做了家庭主妇：“我当了八年的家庭主妇。我有妻子为丈夫牺牲的传统想法，但我也真的受过很好的教育。煮饭时，我总会拿本狄更斯的书在手里。”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给夫妇二人一笔奖学金，赞助他们到美国从事研究。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赵萝蕤则完成她的博士学位。

他们在秋天启程，飞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印度，再转乘船18天，到达芝加哥大学。陈梦家在这趟“超越山峰”之旅中，再次激发了写诗灵感：

看不见喜马拉雅山
云雾堆成山
一切都太寂寞
这里是天上的沙漠

陈梦家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他想要完成《全美中国青铜器》这一计划。为此，在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的期限结束之后，他给冯友兰写信，想要在清华大学申请一年的休假，他的设想是：除了继续学习考古学，还将寻访全美40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系统性编一册青铜器图录。

这一年，他34岁。

在美国的日子，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赵萝蕤后来回忆说。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一言以蔽之，陈梦家为中国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未来的方向。

1946年夏天，去美国访学的冯友兰为陈梦家带去了校长梅贻琦为他新签署的聘书，回清华筹备博物馆。1947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前，他拜访了一个人。

这是全纽约最有名的中国古董商，他叫卢芹斋（C. T. Loo），他因为把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卖至美国而被全世界所知。陈梦家和卢芹斋同是浙江人，后者为他的青铜器研究做了不少贡献。临行前，他劝说老谋深算的浙江商人，捐献出几件铜器，比如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

陈梦家在写给妻子的信里透露了一些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

三

陈梦家对于政治是一窍不通的。

如同他的师长朱自清给他写信，告诉他闻一多先生在抗战之后蓄起了胡子，一日不胜利则一日不剃，他所关心的，却只是自己的研究。

当他回到清华时，他也对国内形势一无所知，沉醉于为清华购买各种古董，筹备博物馆。当时，解放军已经从东北逼近北平，北平城里的遗老遗少们都纷纷撤退，陈梦家觉得，这是自己“捡漏”的好时机。

“与吴（晗）、朱（自清）、潘（光旦）入城，先至西湖营买宫衣十余件。次至尊古斋同吃饭，买古物四千万。我自己买紫檀笔筒一个、小瓷碗四个。”（1948年2月3日）

“今日一早入城，刘仁政在青年会门口等我，一同逛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小市访硬木家具，奔走到晚，中间到振德兴看绣衣，甚可观。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佰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十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约需三百万，托一人去办，我星期四（后天）再入城与刘跑一跑，非常费劲，然亦有趣。各物若合美金非常便宜。”（1948年11月8日）

这种一窍不通，注定了他的悲剧。

1951年11月，陈梦家被迫做了一次检查，检查没有过关，然而，他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学，可以去看杨绛先生的《洗澡》。

赵萝蕤的日记里说，“他时而理性清明，时而感情激动，我虽安闲待之，但真正受不了他”，“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大骂之后果然稍好，比理性说服强得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

陈梦家的诗人性格不能容忍这样的屈辱，而赵萝蕤虽然略微清醒，又何尝不是幼稚，这场运动，难道是一个“不自高自大，不骑高头大马”就可以解决的？

不过，洗了几次澡，陈梦家涉险过关。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陈梦家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两点希望》，他在文章里说：

“我从西安回北京后，纷纷然闻听‘鸣’‘放’之音，好不热闹。这正是花开时节，欢迎红五月的到来，真是一番好气象啊！毛主席两次有关‘鸣’‘放’的谈话，是这几十年中关系了中国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划时代的一炮，它是即将到来的文化革命大进军前鼓励的号角。我个人深深感觉到，一种新的健康而持久的风气已经开始……但不能我等你放我才鸣，你看我鸣得对你才放……我们个人是不能等不能停的，还是赶快的放鸣吧！”

陈梦家的关注点是之前一直轰轰烈烈的汉字简化问题。

早在1941年，他就在《认字的方法》一文中写道：“中国人使用文字，在全世界要算最老的一个民族了。我们使用文字的年数，至少有三千五百年以上。最奇怪的是，经过了三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其实没有大变，有许多字简直没有变。我们知道，商朝人已经有很完备的文字了，它以前的文字现在还没有发现。”

所以这一次，他用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这场“百家齐放”。

他在《光明日报》撰文：“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夏鼐日记里，考古研究所的几次“大鸣大放”，陈梦家都是首个发言，只过了几周时间，大鸣大放被叫停，陈梦家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愤怒的标题：“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四

陈梦家可供攻击的靶子，实在太多了。

一是社会关系和生活经历。陈梦家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他本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年轻时曾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新月派”诗人。岳父赵紫宸是基督教活动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他和妻子赵萝蕤四十年代都曾在美国学习、工作。以上这些生活背景，对于陈梦家的政治形象，全是负面因素。每一项都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派，成为群众的对立面和深度挖掘的对象。

二是陈梦家口无遮拦，个性孤高，很容易遭人忌恨。《夏鼐日记》在1954年记载，“上午赴所至马市大街，晤及陈梦家君，为了昨天郑所长拒绝让他到洛阳去，而大生其气”。郑所长就是郑振铎。反右中有人揭发，他在西南联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他自己的检讨中，也有“抗战期间我住在农村，一般同事瞧不起农民，我也瞧不起这些同事，自以为我总高他们一头。……我们的态度与根本轻视农民的，也没有很大不同，都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

三是陈梦家的收入高，易引发“仇富”心理。除了工资以外，陈梦家的稿酬也相当优厚，生活水平远高于一般的同事。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梦家家中已经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1956年他斥资买下钱粮胡同的十八间平房，房子里还有专门为赵萝蕤买的斯坦威钢琴，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生活水平，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

当然，最核心的，是陈梦家反对推行简化字，与领袖的主张不一致，这就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立场问题。这也因此成为他的同行们，容庚、唐兰等声讨他的口实。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搜集那些罪状，然后发现，实在数不胜数。

他的师长，他的助手，都纷纷撰文，从四面八方七百二十度批评他：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享受着高额稿费，买了一座四合院”

“不尊重老同志的观点”

“用美帝国主义的钱财做研究”

“和卖国贼交往”

……

很多年之后，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当时批评陈梦家的助手，当他把这些材料递给他时，这位已经盛名显赫的专家低下了头，他说：“这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陈梦家看好的几位后生都没有在他的学术道路上走得很远，这位助手却在事实上继承了陈梦家衣钵。不知道九泉之下的陈梦家见到这一切，会作何感想。

定右派的时候，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右派，首当其冲是陈梦家。夏鼐日记里，明确记载了这一事实：

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

陈梦家不仅是右派，还是右派的翘楚。

对他的批判，从1957年7月13日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然后，斗争逐日升高。

8月9日，夏鼐日记里写道：“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

日记里提到的三个发言人，当时还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王世民、王仲殊都成了考古所里的牛鬼蛇神。陈梦家自杀之前，发生在考古所的那次戴纸帽示众游行，二人也都在列。

郑所长，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郑振铎。当时他还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次针对陈梦家的大会：

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

郑振铎和陈梦家，原本是朋友。

他们都爱好收藏。郑振铎每次到考古所，总要找陈梦家聊一聊，有时还结伴去看画展，逛琉璃厂或者隆福寺，他也到陈梦家家里吃过饭。

但反右之后，陈梦家这个名字，从郑振铎日记里彻底消失了，两人再无来往。

1958年，赵萝蕤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被送入协和医院。协和医院要把赵萝蕤转到精神病院，陈梦家当然不肯，于是想托当时的贵人郑振铎，设法使太太能留在协和。他不敢直接去找，只能托夏鼐居中传话。夏鼐有没有传这个话，郑振铎帮没帮这个忙，已经无从考证。

这年十月，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坠毁。

1958年年底，陈梦家被下放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一年多以后，由于夏鼐的关照，考古所把陈梦家派到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刚刚出土的武威汉简。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又重新被调回考古所。右派的帽子摘掉了，陈梦家如释重负，他积极投入工作，脾气也有所收敛。

在下放时，陈梦家仍旧没有中断给妻子写信，其中一封，他说：“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

然而他自己食言了。

五

1980年，夏鼐拿到了陈梦家最后几年的日记，8月24日是最后一篇，上面写着：这是我最后一天。

但事实上，因为药剂量不够，被救了回来。

当时，一向在日记里用简笔的夏鼐震动很大，8月25日，他在日记里特别写了陈梦家自杀前后的一些细节：

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

因为这个细节，现在流行的故事里，有人流传陈梦家在生命最后出轨，与寡妇有不正当关系云云。我每每见到此，都愤怒得不可名状。

事实上，陈梦家在医院里抢救时，赵萝蕤正在接受着红卫兵小将们惨无人道的盘问。

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在第二天去了陈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红卫兵把陈梦熊和赵萝蕤一起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上，“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

陈梦家多活了8天，这8天不能写诗，不能考古，不能做学问，是多么多余的8天。很快，因为他“畏罪自杀”的罪名，医院把他赶回了家，9月3日， he 被发现悬梁自尽，55岁。

六

陈梦家去世之后，赵萝蕤被要求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陈梦熊回忆说：“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因为这个罪名，赵萝蕤被捕了，关了五年。

她的病时断时续，始终没有痊愈。他们的老朋友巫宁坤和赵萝蕤重新相见时，“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萝蕤商量出版事宜，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笑：“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她又伤心的大哭起来。

他们没有孩子。晚年的赵萝蕤脑血管硬化，视力衰弱，她一辈子酷爱读书，却不得不遵医嘱节制用眼，最大的享受便是坐在屋子里，听古典音乐。每年清明，她要祭奠两个人，一个是梦家，一个是父亲：“梦家死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所以我只能是在心里悼念一番。”

而陈梦家，在很久之前，就用自己的诗句，为自己的结局，做了谶语：

我从此永久恬静的安睡，
不用得纸灰乱在墓上飞；
再没有人迹到我的孤坟，
在泥土里化作一堆骨粉。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史玉辉《陈梦家研究综述》
叶辉《陈梦家的稿费及珍贵家具》
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活》
扬之水《读书》十年
巫宁坤《一代才女赵萝蕤》
王世襄《怀念梦家》
何伟《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汤志辉《运动中的陈梦家》
陈晓维《夏鼐日记中的陈梦家》
刘宜庆《陈梦家和赵萝蕤的葳蕤人生》
王友琴《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陈子善《记忆中的赵萝蕤先生》
方继孝《陈梦家往事》

□ 摘自：《山河小岁月》微信号

~~~~~

【史海钩沉】

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

• 阎 淮 •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简称“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由青干局负责，当时青干局中的文革在校大学生，表现“特别优异”的只有两人。另一位两个月前的春节，不与全？局员一起集？空手去为李锐拜年，次日独自带重礼去李家，被李锐看轻。“记录在案”的重担只能压给我，我向北京考察组请假一周。急性子的我，23日星期六（当时每星期只休一天）在中组部文件发出的同日，即起草青干局下星期三召开“北京高校记录在案会议”的通知。25日（星期一）各校同时接到中组部文件和青干局会议通知，他们感慨青干局的效率。

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中，就贯彻“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以上是文件原文）——进行认真学习领会。对“记录”工作的宽严尺度、政策掌握、进度要求进行了详尽讨论，基本按我们的要求达到共识。

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对象。”不是李锐与我有先见之明，我们当时都是陈云嫡系嘛！

几个月后青干局机构确定，分成三个处，我在地方处，先后到东北和华北考察后备干部。当年底，各大学陆续报来“记录在案”的工作总结，其统计汇总工作已经移交综合处，我无暇过问，只索取了清华的资料。当时并未翻阅，现在发现还保存着。

清华“记录在案”原始数据如下：蒯大富的“团派”纪录50人，其中有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14人，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者17人，反军乱军问题严重者13人，武斗骨干6人。此外1970年代逮捕判刑“团派”12人，除蒯大富外，其余11人皆因武斗杀人。“四一四派”记录8人，其中核心成员6人，反军乱军者2人。值得注意的是：被记录的48人都有“主要问题”，唯独陈楚三和孙怒涛，只注明“四一四总部核心成员，未发现什么问题”。

我直接干预基层“记录在案”的“非组织活动”：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学同学汪某，思想简单的书呆子，批斗被毛泽东点名为坏人的冶金部长时，推搡此人。钢铁学院要把汪“记录”。我找他们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领袖点名、小将奈何。汪父只是矿院副院长，

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长，你们还敢记录吗？”汪得以幸免漏网，后顺利国内读硕、赴美读博；发明两项专利，无偿捐赠给差点把他“记录在案”的祖国。

“六四”辞国后，我对中共成立后70年的历史全面重新审视，特别是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的事件深刻反思，“记录在案”是最大的心病。1983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我认识到新专制的危害。1984年初整党检查时。我说：“整党要求重点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我认为：三种人只要不牵涉刑事犯罪，就不应该重新处理；记录在案人员更不必长期纠缠。由于对记录在案者背对背、不处分，因此当时没有立即显现出对其不良影响。但是，文件要求对“没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记录在案，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顶着“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限制使用、无法进取。——我有愧于他们！尤其我的学长孙怒涛和陈楚三，当时经过十几年反复审查“未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还要“记录”！全国类似情况肯定不在少数，我更有愧对他们！

我对“记录在案”的最新认识。中共建政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对“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坚决严厉镇压、实行“杀关管”，即枪毙杀头、判刑关押、监外管制。尤其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甚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政军骨干，即使没有反抗新政权、不构成现行反革命者，也定为历史反革命实施“杀关管”。文革结束，邓小平和陈云等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向后看”——对上至林彪和“四人帮”、下至社会上的“三种人”等毛派文革积极分子和勇敢分子深恶痛绝，必欲判刑和处分；“向前看”——唯恐造反派掌权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学生造反派，具有与“第三梯队”同样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优势，要格外提防（王洪文因年轻在监狱受到特殊“照顾”过早离世）。这就是为什么对“没有问题”的“非老红卫兵”的群众组织领导也要记录在案的原因。我以为：这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同一思维模式和政治考虑。前者有许多老冤死鬼，后者有众多小冤活人！历史应当还他们一个清白和公道！

□ 摘自：阎淮：《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2017年出版

## 【人物春秋】

### 否定文革不如清算文革：专访牛辉林

· 江 迅 ·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牛辉林，在文革中是一个“名人”。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亲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他盛夏避暑办公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当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首都红代会）、“核心领导小组”（核心组）的“五大领袖”，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兵团负责人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谭厚兰，亲自解决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武装对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开枪打死打伤几十人、北京大学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以及其他大专院校两派斗争的问题。

陪同毛泽东召见这“五大领袖”的有林彪、周恩来、谢富治、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央党政军和北京市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物。在这次极其重要的召见中，毛泽东分析了北京大学两大派斗争的形势，十多次说到了北京大学两

大派群众组织之一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七、八次提到了对“井冈山兵团”头头牛辉林，对牛该如何认识、定性。

毛泽东当时说：“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逼供信。可以不提‘杀牛、宰猴、炖羊肉’了。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能否定。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红旗飘’、‘井冈山’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在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是与聂元梓相对立的一派。牛辉林曾被文革的“旗手”江青多次公开点名，指为“坏人”，曾被毛泽东数次关注；曾被文革中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立案，定性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头目，遭全国通缉；也曾被以解放军六十三军为主的北大“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工、军宣队）作为全校“从严处理”的典型，戴“现行反革命”帽子；还曾被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领导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立案，审查“五一六”反革命罪行。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他先后四次被立案，关押、审讯、批斗、劳动改造了三年之久。文革结束后，虽经正式“平反”，但政治劫难接二连三。牛辉林三十七年生涯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或隐或现被纠缠于文革的旧帐中，四十年来始终未能逃出文革噩梦的缠绕。

零六年五月初，牛辉林在山西太原接受亚洲周刊采访，他说：“文革的事始终没有说清楚，不是我们自己没有说清楚，是中共党内没有说清楚。十年文革，四十年的梦，至今也醒不了。虽然中央对文革早有决议，对四人帮作了审判，但对文革没有举国一致的清算，从思想到理论，到实践，到具体人物，对国家民族的危害，没有作出彻底清算。”

牛辉林一九六四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文革期间是北京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头头，毕业后于七零年被分配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六年后先后任职中共县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一九八零年，牛辉林原本被派去吕梁孝义县出任县委书记，后有人举报他在文革中造反，经半年调查后，又调他出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牛辉林八三年被定为共青团省委书记，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未料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全会《简报》中，他被点名为全党唯一受重用”三种人”（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典型，被免去一切职务。牛辉林上访、申诉了两年，最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说他不是”三种人”。

八六年，牛辉林出任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九三年新任总经理组建山西省地产公司，三年后任省引黄工程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二零零零年任省广播电视厅（后改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辉林说：“我与巴金的心是相通的，双手赞成建立一座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哪怕是把自己的灵魂也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纪念文革就要像二零零五年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一样，把当时的史实，把当时各个政党、各个社会阶层、各个人物，都真实地摆在后人面前，让大家公允地作出评论。纪念抗日战争，不是弄清楚许多史实吗？知道了当年国民党是在抗战，这是对民族一个交代。为那些国民党抗战牺牲的烈士重新树立纪念碑。这样中华民族才像个民族，人家做的事就是人家做的，我们做的事就是我们做的，人家做得比我们大，就得承认比我们做得大，人家也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人。讲明真

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才是真正的现代民族。讳病忌医，就永远是病人，病越来越重，病入膏肓。要想治病，第一条就是不讳疾忌医，明明有病却不承认有病，病就成为病灶，一旦发作就要了命。”

牛辉林是文革过来的特殊人，因此特别关注对文革的反思。他认为，三十年前，整个国家对文革可用三句话概括：举国一致，批四人帮，否定文革。有一种是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要重新塑造毛泽东；另一种是否定文革，也否定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有罪的；还有一种是否定文革，搁置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争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有了变化：全民淡忘，年轻人不知文革为何物，因为文革问题被搁置，没有被彻底否定，对国家和民族危害极大。现在所存在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党内民主、干部作风、民族心态问题都与文革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当今社会还出现客观上肯定文革而否定三十年的改革成果的思潮，出现主观上肯定文革而怀念文革的思潮。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所有参加校史文革史整理工作的人，都对牛辉林作出一致评价：这个人在政治上“了不起”；这个人在做人做事上“是个好人”，在文革中他是北大唯一真正对江青、对中央文革和文革运动有非议、有批判而受到严重政治迫害的人，他是北大文革期间唯一当过头头，却没有任何“个人伤害史”的人。他们说，牛辉林应该把自己在北大文革期间的经历写出来。二零零一年五月，牛辉林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牛辉林表示，他会写三部书：第一部《瓦全者说——十年的“文革”四十年的“梦”》之第一部《别来沧海事》，三十万字，以及《再话巴山道》、《秋山有几重》两部。目前正在创作第一部。他说：“我写书不是要针对聂元梓，我看了她的书《聂元梓回忆录》。”

牛辉林还说：“我写书，不会与聂元梓对照着写，她八十多岁了，从秦城监狱出来，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本书替自己说话，也能理解。但历史的真相还是要还本来面目的。我有这个责任。”

□ 摘自《亚洲周刊》

~~~~~

【各抒己见】

为罪恶招魂

• 贺卫方 •

把毕业的未毕业的学生大规模地下放到农村，在和平年代终结教育体系，这是曾经发生过的，让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种罪恶。即使用那些踌躇、猜测、论证出来的目的粉饰，也改变不了人类自产生文明史以来最为诡异的事实。毛泽东 1968 年的最高指示已经过去了快 50 年，可“很有必要”的“按语”，依然无解。

大中小学一概停止招生，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荒唐之举。

潘忠林，算不算知青博物馆的负责人了？我不知道。不过号称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大话过头了。潘先生称：知青博物馆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他说 1955 年的上山下乡的杨华就与文革无关，对的。可是知青博物馆更多的内容却不是杨华。在回答贺卫方的评论时，潘先生显然偷换概念，而且混淆了历史。潘先生自称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是不是搞错了？潘先生体验的是哪一段知青历史呢？你有没有体验过 1968 年以后的知青历史呢？

我是个知青，巧了，当年下乡就在黑河地区所属孙吴县。下乡那年15岁，同学里还有小的，14岁。现在退休了，社保的跟我同学说，14岁那年的工龄不能算，按现行法律规定14岁是童工，所以不算工龄。怪事吧。法不追溯既往是为原则，不算工龄就能遮掩大范围使用童工的丑恶吗？我的同学69届，大的16，小的14。拉到黑河一列火车。

整列整列火车把心智发育不成熟的孩子送到边地干啥呢？反修防修还有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从1969年冬天一直到1970年，我们看到的是公路上南行不断的拉家带口的卡车。后来知道，是黑河地委全线南撤200多公里到了北安，是指挥战斗么？留下了到现在还理不清的房地产问题种种。

难不成是毛泽东同志留下我们，用发育未成的血肉之躯在黑龙江抵挡苏制T62坦克不成？

不去正视、面对历史的真实，而美化知青上山下乡，知青博物馆是要为罪恶招魂么？

◇ 嗜痂之好

潘先生说知青博物馆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点明了目的。更进一步解说知青精神，“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再进一步他还要弘扬知青精神。这跟头几年侯隽、邢燕子们的论调如出一辙，只不过文字表述略有差别。

潘先生说办馆的目的，要传承它（知青精神），要弘扬它。

上山下乡直接的现象就是把中学生送到农村边疆地区，这场空前绝后运动的影响着全国所有城市人口。乃时，全国人口7亿，农村人口即使按90%计算（实际远不止此），城市人口只有7千万。按一个家庭5口人计算（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全国城市只有1400万户，而知青数量的下限是1700万。覆盖着从1947到1957（甚至更多），所有城市出生的人口。

担当、奉献、拼搏、创业，都是当下的时髦用语。字面上显现的是人的主动。主动担当（按潘先生的说法是，你是共和国的长子，国家有困难云云。这个说法实在有点扯），主动奉献，主动拼搏，主动创业。真如是么？请潘先生找些知青谈谈他们的主动精神吧？用了这么多的好词，请他们跟你一起聊聊返城的经历不好么？当年怎么会出现知青大返城，风起云涌，势如破竹，开了口子的洪水般地势不可挡呢？

不知道潘先生怎么就归纳出来知青精神？

说担当，我没有，我认识的知青（绝大部分在黑河地区）从来不意识下乡是为了什么担当。“迫不得已”、被迫的才是历史的真实。你兴许也能找出个例，如果你有闲暇，还有兴趣去找，如去内蒙插队的曲折等人。这些个例恰恰能证明当年上山下乡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无奈。

想想，你不下去行么？有谁，有“担当”起国家困难舍我其谁的责任？你让他举手。如果当时有学校，我肯定去上学，绝不去弄个木头棍子比划保卫边疆。

说奉献，怎么说呢？一个人一生最好的时光被荒废了，全扔在荒草甸子里，至今不知所归。套用梁晓声的话“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流浪的青春是1700万，在桦树林子、草甸子、黄土高坡。

说拼搏，拼呀、搏呀，总得有个目的吧。你进山扛回根木头，为取暖，毁了生态毁了大森林。1969年，邓丽君16岁花季第一次到香港演出。美国阿波罗在月球上走了一小步。“苹果”创始人才刚刚上大学。加州大学的两个学生用电线联上了两个笨重的计算机，世界互联网就这么悄没声地发端了——

潘先生你猜猜我们干啥呢？正在“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呢。

说创业，潘先生您就太扯了。估计您不是学经济的，也许数学也不太好，您不妨请高人算算您眼皮子底下的一师一团和三团兵团时期的经济帐。您再算算投入了多少知青，创出了什么伟业。

还有那个叫郭小松的，不知是何方的高人，说“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真是应了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郭称“鸡永远理解不了鹰”。一定把自己当鹰了。一只大尾巴鹰盛赞上山下乡，是不是忽悠？是不是哗众取宠？

不知道郭小松今年多大了，是不是结婚生了孩儿。用人大教授张鸣的话正好回应这只伟大的鹰，“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我再看补一句话，鹰啊，你要是没孩子，有七姑八姨的孩子也成，再不济，你就听张鸣的，展开你的翅，飞到西北去吧。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知青的群体实在太庞大，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反应那段充满了灾难的历史无疑功德无量。但是应景的，打着知青招牌谋利的就为人不齿了。

头些年，侯隽、邢燕子等当年知青的楷模活跃了一阵子，还弄出了一本书到处推销，《周恩来与知青》大约就是这么一本书吧。对于1700万知青，周恩来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能让当年的楷模引以为自豪的是得到过周恩来的召见，等等。今天拿出来，你是炫耀那一段灾难性的历史呢？还是想干什么呢？江青不是也给侯隽送过草帽吗？江青倒了，就说你对那草帽从来不屑一顾了。那是第一夫人啊，你当时还不是美得冒鼻涕泡么？

知青历史的生成发展脉络基本已经清晰，不同阶段性质不同也不用再争辩，唯独无解的是毛泽东“很有必要”的按语。有太多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很有必要”，于是为1968年大规模的毫无人道精神的上山下乡，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层面寻找理由。而我坚信，行为就是行为，目的代替不了行为。出发点如何高尚，抵消不了负面的行为后果。因此，以最高指示主导下的上山下乡毫无疑问是文革的一部分，必须进行否定。而与此前的知青运动也不容混淆。毛泽东1939年的讲话，其时代背景是民族抗战。不论是1955年的杨华们，还是后来的邢燕子、侯隽们，以及文革时期的我们，都已经是和平年代，背景完全不同。

青年是不是革命的，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1939年判定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衡量和平年代的青年是否革命，能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起码值得讨论。如果今天还有具像的行为方式，那么今天最大劳动群众群体是“农民工”，是不是要看你能否与农民工相结合呢？

文革本身就是政治的混乱，社会的混乱，不用说了，以经济困难容不下就业解释上山下乡必要性的注意了，北京67届几乎全数去了山西、陕西，而山西的67届毕业生却全数在工矿安排了工作，你怎么解释呢？1968年山西隰县一个至今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一次招兵160多个，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初中，大部分高小也不是。这些兵直接进北京支左。讽刺的是直管文化口，整天监督京剧团排练样板戏。

现在知青群体里的思想是混乱的，对自己亲历的历史认识相悖，这是令人遗憾的。其中最令人感到恶心的一个说法，是上山下乡锻炼培养出了他的坚强性格还有不怕苦的性格。第一，原来的性格无从考证，因此你现在的性格是不是下乡锻炼出来的就无从考证。第二，人类优良的性格有很多，坚强只是其一。你很坚强，可是你无知，怎么体现你的坚强呢？第三，坚强的性格并不一定通过上山下乡锻炼而成，形成坚强性格的渠道有无数种。第四，用四五年七八年锻炼你的坚强，你还乐道，只能说明价值观出了问题。第五，你最好的年华在蛮荒大野流浪不知所踪，不留神造就了你的坚强性格，充其量是副产品。正如被人强奸了，有幸得了个胖小子。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六，你要是觉得值，不妨追随那只鹰，让你儿子、孙子到大西北，也锻炼锻炼坚强性格什么的。

◇ 博物馆好坏评价

潘先生说：“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又说：“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

知青博物馆办的好不好，在于你有什么办馆的思想和方针。客观的记录和展现历史的真实，才是你做馆的第一要务。对于语焉不详、模模糊糊的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缺乏时代感的故意拔高，尤其就显得做作和不实。你要从正面介绍知青的历史，不打自招，说好听的你人为的规避一部分真实的历史，说直白了，你不是在恶意篡改历史吗？如是，你有什么脸面对历经人间苦厄的1700万知青曾经的花季、青春呢？

尤其是120元的门票，你不是在借知青的名义敛财吗？你有什么内容票价要超过故宫几倍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